

亚太产业模式转型与中国产业战略调整初探

杨培雷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亚太产业模式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表明, 传统的亚太产业模式已经向新的模式转型。亚太产业模式的转型正在为亚太地区的后进国家提供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本文在对亚太产业模式变化分析的基础上, 对我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重点产业选择和定位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提出中国应把机械、运输设备、化工、医药等产业作为参与亚太分工的关键性目标产业。

关键词: 亚太地区; 产业结构; 转型; 关键产业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952(2003)07-0039-0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半个世纪, 亚太地区^①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呈现出较为稳定的“阶梯”特征。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 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征, 从而也对我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提出了新的要求, 需要我们对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关键产业做出合理选择。本文在分析亚太产业模式及其转型的基础上, 对我国有效地参与亚太分工的产业战略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传统的亚太产业模式

战后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基本上印证了弗农(R.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②。只不过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两项新开发的产品, 而是上升到一个更宏观的层次, 表现为产业层次的周期循环运动。一个新兴产业部门(包括用新技术重新装备的原有产业部门)首先在美国、日本兴起壮大, 经过一段时间开始向亚洲“四小”等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亚太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 产品完全标准化, 大批量生产成为现实, 劳动成本成为关键因素, 生产便开始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太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盟等地转移。这种转移往往是通过大量先进国家(地区)向落后国家(地区)的直接投资而展开和实现的。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曾提出过雁行形态理论^③, 并用来描述和分析亚太地区各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传递性, 从产业角度讲, 他的观点与产品周期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 赤松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观察和描述, 不象产品周期理论那样具有内在逻辑说服力。

根据产品周期理论, 我们可以将亚太地区处于不同分工阶段(或阶梯)的国家(地区)在产业国际循环和转移中各自的生产结构、出口结构、进口结构、直接投资结构情形做出相应的归结(见表 1)。

表 1 亚太国家(地区)的分工阶梯

项 目	第 I 阶梯(美、日)	第 II 阶梯(亚洲“四小”)	第 III 阶梯(东盟)
主要生产部门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主要出口部门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收稿日期: 2003-04-02

作者简介: 杨培雷(1966—), 男, 安徽阜南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续表 1 亚太国家(地区)的分工阶梯

项 目	第 I 阶梯(美、日)	第 II 阶梯(亚洲“四小”)	第 III 阶梯(东盟)
主要进口部门	劳动密集型(为主) 资本密集型(为辅)	技术密集型(为主) 劳动密集型(为辅)	资本密集型
对外投资部门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接受外资部门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二、亚太产业结构新变化与模式转型

如果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亚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基本上是遵循产品周期原理演变过来的,那么,在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以来,亚太产业结构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现出新的特点。

特点之一:产品周期缩短趋势明显,产品周期中的某些环节甚至被压缩到可忽略的地步。雁形产业发展模式(产品周期的一种派生形式)告诉我们,某一新兴产业往往要经历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这样一个过程。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产品周期不仅缩短,而且其中有的环节趋于消失,最明显的表现是进口和进口替代环节的缩短甚至消失。不仅日本,甚至像韩国这种第 II 阶梯国家,随着自行开发新产品或消化吸收新技术能力的提高,它们跳过了进口阶段,直接开始新产品的国内生产,并且国内生产一开始就不只是一种进口替代,而是面向海外出口市场。如韩国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就呈现出这样的特征。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电子产品上,在其他大多数技术密集型产品上也普遍存在。

特点之二:亚太阶梯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调整中,不同阶梯国家(地区)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与外资结构之间错位的现象日益突出,导致产品周期循环的扭曲和变形。

首先,生产结构同贸易结构脱节,这在第 II 阶梯国家(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产品周期理论,第 II 阶梯的亚洲“四小”目前应正处于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替代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这一发展阶段。这是由它们前一阶段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替代直接演变而来的。然而实际发展情形却并非如此。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在经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扩张和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替代后,并没有走上资本密集型产品大规模出口替代的道路,而是先后走上直接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的道路。

其次,直接投资结构与产品周期模型的背离也日趋突出,对亚太地区产业周期循环的变形和复杂化构成潜在驱动力。按照产品周期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发生在产品的标准化和衰退时期。但近 20 年来,亚太地区第 I、第 II 阶梯的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在产品周期循环中超前倾向愈来愈明显,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并不等到产品衰退期才开始,而是不断地提前到产品成熟期,甚至有的在产品尚处于创新阶段就已发生,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从事当地研究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特点之三:规模经济作用在产品周期不同阶段的演变日益成为影响产品周期运行的重要因素。在产品周期模型里,创新阶段中规模经济并不重要,因为产品尚未定型,无法大批量生产,而且产品价格弹性较低。只有进入成熟阶段后,规模经济才逐渐发挥作用,大批量生产成为降低成本和价格的重要途径,创新国凭借规模经济继续保持出口优势。但到了标准化时期,规模经济优势已被利用殆尽,要素成本在降低价格中起主导作用,创新国开始考虑对外直接投资,从事海外生产,同时后进国家(地区)因国内需求扩大,规模经济显现,再加上要素成本低廉,开始在出口中获得绝对优势。

然而在当今的亚太分工体系和产品周期循环中,规模经济的作用方式已大大改变,其表现有:1. 创新阶段规模经济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由于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研究开发投资和风险十分巨大,厂商必须迅速进入并占据全球市场,才能在短期内收回投资。2. 规模经济在导致

第Ⅰ阶梯国家(创新国)向外直接投资、转移产业的机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同于产品周期理论的分析。在产品周期理论里,只要规模经济优势占主导,创新国就会仍然以出口方式输出产品。只有当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已被耗竭殆尽(即产量增加不再或很少使成本下降)或规模经济优势已不如要素成本优势重要时,才会考虑对外转移生产。而在当今的阶梯型亚太分工体系中,高阶国家的对外投资并不是因为规模经济优势的丧失,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

基于上述重大变化,有人认为雁形模式已不再适用于亚太地区的产业分工和转移,纷纷提出新的修正模式。其中较有影响的有:1. 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或称喷泉模式,认为亚太经济已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不再是由一、两个领头国家(地区)所带动的“雁阵”。2. 齿轮组合型整体啮合、联动增长机制。认为美、日、“四小”、东盟和中国大陆等通过相互提供市场、相互投资、技术转让等联系形成一个齿轮组合式的经济整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3. “四小”模式。突出“四小”在亚太格局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四小”将取代日本美国成为带动亚太经济整体增长的“市场的发动机”。4. “双头列车”模式。突出中国潜在的巨大需求市场(商品和资本)的地位,认为今后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经济将不仅有日本、美国在前面拉,还有中国在后面推,从而形成“双车头”增长机制。

我们认为要正确辨别亚太经济格局,应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一是产业角度。尽管亚太地区的生产周期循环发生了重要变形,低阶梯国家(地区)参与高阶国家(地区)的水平分工范围有所扩大,但从根本上讲,仍未摆脱垂直分工为主的特点,只不过垂直分工的层次向上跃进了。因此从产业角度看,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产品周期模型(或雁形模式)仍将适用于亚太地区经济,第Ⅰ阶梯国家(地区)仍将充当先进产业的“领头雁”,但是,在没有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前,第Ⅰ阶梯国家(地区)“领头雁”的“只数”将越来越少,相当一部分被后来“雁群”赶上,因为第Ⅰ阶梯国家真正能独树一帜的尖端行业产品将越来越少,大部分面临着第Ⅱ乃至第Ⅲ阶梯国家(地区)的激烈赶超和竞争,从而亚太产业“雁阵”将发生较大的变形。其二是供求角度。从历史上看,第Ⅰ阶梯国家曾带动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这既体现在它们(尤其是美国)为大多数亚太发展中国家(地区)提供了广阔的产品市场(需求方面拉动),又体现在它们以直接投资方式为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供给方面推进),这样一“推”一“拉”为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动力,使得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能迅速发展起来。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Ⅰ阶梯国家无论在“推”(资本供给),还是在“拉”(商品需求)方面的力度都大大削弱,相反,第Ⅱ、Ⅲ阶梯国家和地区之间不仅相互“推”(“四小”对东盟、中国大陆投资急剧增加)、“拉”(第Ⅲ阶梯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需求不断上升)的作用力加大,而且还对低速徘徊的第Ⅰ阶梯经济起了很大的需求带动作用。因此,从供求角度来看,在亚太地区经济平衡中,第Ⅰ阶梯(美、日)的作用确实发生了质的变化,已无法再胜任“领头雁”的角色了。而第Ⅱ、Ⅲ阶梯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增长的作用机制则上升到主导地位,成为今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器”部分。

三、中国参与亚太产业分工的战略选择

当前亚太产业周期循环的显著变化之一便是产业周期不断缩短,某些产业周期环节如进口替代压缩乃至消失。这一变化特点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亚太分工体系中第Ⅱ阶梯国家或地区与第Ⅰ阶梯国家竞争的产业(主要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口替代过程缩短,从进口到出口的节奏加快,从而将放弃一部分与第Ⅲ阶梯国家和地区竞争的产业,并把这部分产业让渡给第Ⅲ阶梯国家发展。这部分产业中大多数就我国国内而言属资金技术相对密集,而在国外则是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另一方面,第Ⅲ阶梯国家和地区也可能利用技术转移加快、产业周期缩短的国际环境,加快进口替代进程,积极地由进口替代转化为出口导向,参与亚太产业更高层次的分工。这里最有可能的也是我国国内资金技术相对密集而国外则是劳动相对密集的行业。

当前亚太地区产业周期循环的第二个变化是生产、贸易以及投资活动的结构性错位和超前性发

展。在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方面最集中地体现为第Ⅱ阶梯国家和地区贸易结构超越生产结构,亦即第Ⅱ阶梯国家和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导向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就走上了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尽管有可能只是在相对水平上)的出口发展道路。姑且不论它们的发展轨道是否正常,我们至少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可能,即我国作为第Ⅲ阶梯国家承接第Ⅱ阶梯国家和地区没有得以充分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经过国内发展,再迅速将之培养为出口主导产业,填补在亚太分工体系中这一产业的空缺和不足。当然这只是外在的有利条件,还应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吸收能力。鉴于我国工业基础技术装备水平相对较低,资金不太充裕,就业压力大,我们可考虑将第Ⅱ阶梯国家和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劳动也较密集的产业(也就是说相对第Ⅱ、第Ⅲ阶梯国家和地区而言资本密集,但相对第Ⅰ阶梯国家而言是劳动密集的产业)列入优先发展项目。

当前亚太产业周期循环第三个变化是规模经济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传统的纯粹以寻求廉价劳动成本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高阶梯国家中已不再占重要地位,追求差别化利益和规模利益进行海外生产转移已构成当前亚太地区产业转移的显著特征。其结果便是亚太地区不同阶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水平分工有所扩大。这些规模经济突出和水平分工扩大的产业相当部分是属于我们所界定的目标产业范围(当然也有很大部分属于那些就是从国际意义上讲也是资本乃至技术密集的产业,大规模发展它们,国内条件尚未成熟,这里姑且不论)。

我国过去参与国际分工,过分注重传统的比较利益原则,过分强调我国同其他国家经济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从目前看,我国在劳动力(或许还有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和出口一些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在亚太产业周期和产业分工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仅仅按照比较利益分工是远远不够的,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格局十分脆弱,会造成国内产业结构滞后。从中长期看,作为一个正在迅猛发展的经济,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口众多,以及因经济增长而形成的巨大市场需求,在于作用越来越明显的规模经济。当今亚太产业分工中规模经济作用日益突出,无疑为我国发展规模经济行业,参与相对水平的产业分工提供了外部条件。这也迫使我们适当限制发展那些单纯靠劳动成本优势才得以发展的纯粹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发展资金技术相对密集、规模经济较为明显的产业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适度控制国内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生产及出口的过分增长,还将有利于我们培养扶植一批以新的目标产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产业,这有利于我国生产和出口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荷兰病”是世界经济中众人皆知的事实,它是指荷兰由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大量出口,损害了制造业产品生产和贸易,导致国内产业结构低级化,最终对国民经济和人民收入水平造成不利影响。因为新部门的扩张导致成本(工资、利率)上升,此外新部门出口高涨引起本币升值,其他产品出口萎缩。这种所谓的“荷兰病”病因不一定局限于自然资源部门的过度开发,它也可能是其他一些附加值较低的产业部门的过度发展。其实,我国国内意义上的纯粹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扩张如果不得到适当控制,它就同样会妨碍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长期影响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因为这些产业占有大量资源,引起工资成本、资金成本上升,从而不利于高级化产业的发展;此外,这些产业产品的大量出口,对本币升值形成压力,从而不利于高级化产业产品的出口。长期如此,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无法升级换代,国民经济将在一种低级结构的约束下低效运行,无法提升。

一国选定的主导发展产业应满足以下三个标准:1. 收入弹性标准。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在产业结构中比重提高。2. 全要素生产率标准。选择生产率上升快的产业优先发展有利于一国经济增长方式向效益型转变,并提高出口竞争力。3. 关联度标准。根据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前向、后向联系大、能带动其他产业增长的产业应优先考虑。根据上述分析,结合以上三条标准,我国应把国内意义上的资本、技术相对密集产业(最好同时又是国外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如机械、运输设备、化工、医药等产业,作为今后重点发展、参与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关键性目标产业。

注释:

- ①本文中的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日本、亚洲“四小”、东盟及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四小”指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
- ②美国经济学家弗农(R. Vernon)首创了产品周期理论(见 R. Vernon, 1966,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p191—202),该理论认为,一项新开发的产品同任何生物一样,也存在一个生命周期。他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产品阶段,成熟产品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产品的特征存在很大差别。
- ③日本经济学家赤松的雁行形态理论描述的是亚太地区的雁形产业发展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某一新兴产业往往要经历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的过程,形同大雁飞行,又名雁形模式。

参考文献:

- [1]Hoekman, Bernard. (2002)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Trade Architecture for Development*[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757, World Bank, Washington.
- [2]Krueger, Anne O. . (1999)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Next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118, World Bank, Washington.
- [3]Srinivasan, T. W. . (1998)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fter Doha*[R]. Economic Growth Center Discussion Paper No. 842,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 [4]Arther Lewis. (1978) *Growth and Fluctuation*[M].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 London.
- [5]R. Adhikari. (1992)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y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anchester.
- [6]Grossman, Gene M. , Helpman, Elhanen. (1991) *Innovation and Growth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M]. MIT Press, Boston.
- [7]Chase, Richard. (2001) *Operations Management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9th ed.) [M]. McGraw-Hill/Irwin, Boston.
- [8]Humphrey, Brad. (2000) *The 21th Century Supervisor: Nine Essential Skills for Frontline Leaders*[M]. San Jossey-Bass/Pfeiffer, Francisco, California.
- [9]Walton, Gary M. . (2001) *Understanding Economics Today* (7th ed.) [M]. Boston: McGraw-Hill/Irwin.
- [10]Sengupta, Jatikumar. (2000) *Dynamic and Stochastic Efficiency Analysis; Economics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M].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

The Transi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sian-Pacific Region and China's Strategy

YANG Pei-lei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and new characteristics have appeared i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Asian-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1980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patterns of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the paper makes some tentative probe on the selection and orientation of key industries i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sian-Pacific division of industrial commitment. Moreove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render such industries as machineries,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s, chemicals and medicine the key target indust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division of industries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Key words: Asian-Pacific Regio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ition; key industry